摘　要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所构筑起来的“商州世界”则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表征。纵观他的“商州世界”，有一个从破碎到重构的过程，显示出了贾平凹题材选择及情感寄托的某种偏向。多年来，他往返于商州和西安两地，深入民间体察商州人的日常生活，营造出“商州世界”这一独特的艺术景观。以贾平凹的“商州”书写为中心，可以勘探贾平凹文学书写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特征。

第一章：引言。概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等。

第二章：贾平凹与他的“破碎的商州”。通过贾平凹小说中关于商州的描写，阐述商州破碎的三大特征，即传统的迷失、景观的破坏和民俗的解体，告知人们商州是如何从原始家园到焦虑之乡。

第三章：贾平凹与他的“重构的商州”。在第一章分析基础上，结合相关作品，探究贾平凹对商州形象重构的方式，包括民间文化的召唤、民俗仪式的复活和纯粹生活场景的再现。

第四章：贾平凹与他的“反思的商州”。在对商州形象的塑造之中贾平凹持有着双重意识，一方面，他出生成长于商州，对商州有着某种血缘般的情感和心理归属感，对商州的艺术形构也有着“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另一方面，他长期生活于现代化大都市的西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审美旨趣、道德伦理、情感姿态等又使得他对商州多了更多的理性与反思，导致贾平凹的商州重构充满着矛盾统一的吊诡，对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诸多方面的启示，也为学者和读者留下了更多思考和探究的空间。

关键词： 贾平凹；商州形象；重构。

ABSTRACT

Jia Pingwa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ocal literature. The Shangzhou world constructed by Jia Pingwa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s. Throughout his Shangzhou world, there is a process from fragmentation to reconstruction, which shows some bias of Jia Pingwa's theme selection and emotional sustenance.Over the years, he traveled to bakeries and xi 'an, deep folk culture People's Daily life, create the world of this unique art landscape bakeries Written in Jia Pingwa's culture as the center, can the exploration with regularity of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Jia Pingwa literature writing.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The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and status of the research are summarized.

Chapter two: Jia Pingwa and his "broken Shangzhou". Through Jia Pingwa's description of Shangzhou in his later novel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Shangzhou, namely the loss of tradition, the destruction of landscape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folk customs, and tells people how Shangzhou changed from its original home to a land of anxiety.

Chapter three: Jia Pingwa and h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Shangzhou".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first chapter and the combination of related works, the way Jia Pingwa reconstructed the image of Shangzhou was explored, including the call of folk culture, the revival of folk ritual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ure life scenes.

Chapter four: Jia Pingwa and his "reflective Shangzhou". Jia Pingwa has dual consciousness in shaping the image of Shangzhou. On the one hand, he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Shangzhou, he has a kind of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ense of belonging to Shangzhou like blood, and he also has a "cultural holder's internal vision" for the artistic structure of Shangzhou. His long life,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xi 'an, the value idea of modernity and aesthetic purport, ethical, emotion attitude and makes him for much more rational and reflection, bakeries in Jia Pingwa culture reconstruction is riddled

with contradictions and unified paradox, provides many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vernacular literature creation inspiration. It also leaves more space for scholars and readers to think and explore.

Key words: Jia Pingwa; The Image of Shangzhou; Refactoring.

目　录

摘　要.....I
ABSTRACT.....II
第一章 引 言.....1
一、 研究背景.....1
二、 研究意义.....2
三、 研究现状综述.....2
第二章 贾平凹与他“破碎的商州”.....7
一、 传统的迷失.....7
二、 景观的破坏.....12
三、 民俗的解体.....16
第三章　贾平凹与他“重构的商州”.....20
一、 民间文化的在场.....20
二、 民俗仪式的复活.....23
三、 生活场景的再现.....25
第四章　贾平凹与他“反思的商州”.....29
一、 城市焦虑中的家园想象.....29
二、 双重视野中的多面商州.....32
结　语.....36
参考文献.....38
致谢.....4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43
已发表论文.....43

第一章 引 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不可不提的一位“鬼才”，他的作品如《商州》《浮躁》《废都》《白夜》《秦腔》《古炉》《老生》等，每次出版皆能引起巨大反响，并深受读者、学界重视与市场追捧，成为当代文坛的“常青树”。贾平凹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追随时代脚步，立足社会现实，聚焦时代巨变背景下的悲欢离合。尽管他始终致力于乡土空间的书写，却能够在“小传统”中融入对大时代、大潮流的思考，这使得贾平凹在传统与现代、小传统与大背景中取得某种平衡，充满着自我调适的张力。

在空间理论看来，任何空间都不是空的空间，不是某种背景或舞台，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一种精神或文化的集散地，它本身就是意义之网。因此，任何作家都有其文学的源发地，比如鲁迅、老舍；比如沈从文、汪曾祺；比如莫言、韩少功；……。从发生学上说，作家的题材偏好、风格塑造、价值取向、审美意识等都与其出生地大有关联。作为贾平凹的故乡，商州是其生命之根，是其记忆的源头，是其情感寄托之处。因此，“商州”成了贾平凹创作的“原型”，是他创作的“母题”或“深层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贾平凹在时代风云中始终保持旺盛创造力的“文化之根”，他的《商州》《商州三录》《商州世事》《商州散记》等直接为“商州”立传；他的《浮躁》《山地笔记》《鸡窝洼人家》《正月·腊月》等则是“商州”的“名片”制作。“商州”滋养了贾平凹的文学生命，而他，也赋予了“商州”之文学史意义。也就是说，“商州”对贾平凹而言，并非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亦非是确切的地理空间，而是一种精神故乡，一种情感和灵魂的归属地。

新世纪以降，西部大开发的纵深推进，作为贾平凹精神家园的商州遭遇到空前转型，曾经在传统中静然独立、守护地方性习俗的那片故土，在贾平凹笔下呈现出破碎之像。他的《怀念狼》，他的《秦腔》，他的《古炉》，他的《带灯》等，无不带着作者对商州的回眸远眺，带着贾平凹对破碎的精神故土重构的愿景。因此，自《老生》到《山本》，贾平凹开始探寻商州重构的策略，无论对传统文化的美学临摹，对原生态生活场景的艺术想象，还是对乡土价值观的审美重建，都是他重构精神故乡的艺术

展演。对“商州”的重构成为贾平凹在现代性与全球化中自我审视与精神回归的探索。

就上述情况而论，对贾平凹的“商州”的研究，即是探寻作者的价值归属与精神历程的途径。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从学术上看，在前人随贾平凹的整体研究之中，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贾平凹塑造的“商州世界”研究较为多样，在空间理论这一视角下也有深入讨论，但在商州形象的变迁，尤其是“商州”破碎之后的重构方面，研究还较为有限。而“商州”作为贾平凹的现实生命与文学生命之根，其形象变迁恰能够反映出贾平凹创作思想上的转型变革，对于贾平凹作品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从实践上看，传统的乡土社会在现代性力量的强行切入下从温馨的家园变成破碎的故土，曾经象征着乡土的传统文化、景观以及民俗逐渐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乡土中国如何维持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如何保持传统文化的活力？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已成社会共识，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无缝对接，乡土文明正面临着重新焕发生机的利好。贾平凹的商州形象的艺术重构，无疑处于这一特定的历史语义场。他对乡土文明的民族志深描也因此多了审慎和思考，从破碎的商州，到重构的商州，到反思的商州，则标示着他经年思考的清晰路线图。而他的思考，则对当下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样本。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贾平凹作为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学界对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也较为广泛，通过搜集关于贾平凹文学作品研究的文献资料，选择与本文相关文献进行研读，梳理前人研究观点成果，对研究现状综述如下：

一、关于贾平凹商州世界书写的研究

张慧娟《魂系商州古韵西京——贾平凹长篇小说艺术论》（2011）以贾平凹十部长篇小说为研究素材，从小说取材特点、人物世界、语言风格三方面解析了贾平凹长篇

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商州作为贾平凹的故乡，也是精神所依、灵魂所系的故土乡村，与作为都市代表的西京，共同为贾平凹提供着灵感和素材，成为滋养其文学生命的地带。王玉珠《贾平凹小说中的“商州世界”及其变迁》（2012）选取贾平凹不同时期书写商州的五部作品《商州初录》《浮躁》《高老庄》《秦腔》《高兴》为素材，从中分析了贾平凹笔下“商州世界”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变迁过程，分别概括为：商州的审美观照和诗意书写、商州社会精神躁动的冷静审视、知识者精神回乡的尴尬书写、乡土商州的颓下与乡村文明的挽歌、农民的城市生活与心灵变迁。程锦《从商州到废都——论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农非农视角》（2012）认为贾平凹小说创作从诗意商州，到废都书写，反映了时代巨大变迁对贾平凹思想与阅历的触动和洗礼，导致了贾平凹创作的大转型，贾平凹农非农视角的独特价值由此体现。程华《贾平凹与商洛文化》（2016）分析了商洛文化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贾平凹文学创作与商洛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作家的行文风格、审美品质也被商洛地区的自然环境深深地影响着，民间巫术崇拜造就了贾平凹小说中的魔幻与神秘，大量民间方言、古语被用于贾平凹小说中，也彰显了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栾梅健《一样的商州不一样的叙事——论贾平凹近十余年的文学创作》（2017）分析了贾平凹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并按照作品特征将其划分为“商州文学”、“废都阶段”、“老生阶段”三个阶段，着重对老生阶段作品，也就是近十余年的作品叙事特征进行了探究，揭示了贾平凹叙事视角从平面视角向立体俯视视角的转变。唐曌堃《贾平凹文学作品中商洛民艺元素的美学梳理》（2018）以贾平凹商洛背景的文学作品为素材，分析了贾平凹的地域创作特点，即文学与美学、哲学、艺术之间的关联，从美学视角梳理了贾平凹作品中的商洛民艺元素，即突出商洛文化积淀的审美信仰、彰显商洛民俗礼仪的审美共鸣、展现商洛地域风貌的审美态度。王雅《贾平凹对商州地域的"精神书写"》（2018）认为贾平凹的商州精神书写突出呈现为两方面，分别为对故土母性品质的诗性探索，即寻根的商州，以及民间巫鬼阴习的神幻艺术，即秘境的商州。孔灵《贾平凹的商州烙印》（2019）探讨了商州文化的神秘性、浑朴性、包容性三方面特质对贾平凹文学创作的影响，分别作用于贾平凹作品中的人物与民俗呈现、作品风格选择、俗气与漫画式幽默手法上。张学昕、贺与诤《简洁而浩瀚的“商州美学”——贾平凹短篇小说阅读札记》（2020）着眼于贾平凹短篇小说，指出贾平凹将商州的地域环境与人文状况融入到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以“商州美学”呈现出了其短篇小说的独特个性和叙事风貌。

二、关于贾平凹笔下商州世界中乡土情节的研究

陈雀倩从《<秦腔>论贾平凹近期乡土书写的延变与意义》（2012）通过回溯贾平凹的《秦腔》与近期乡土写作的关系，对该作品及贾平凹写作风格的变化进行解读，以作品中人物引生和夏风的对立形象分析，对《秦腔》的叙事形式与主题展开探讨，又以作品中最后一位拥抱土地的人物夏天义为典型，分析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探讨农村社会中逐渐消失的农民性，以及自从“乡土中国”以来的宿命，进而分析贾平凹乡土写作在创作形式上的延变意义。张雪峰《浅析贾平凹<商州三录>中体现的农村生活的转变》（2015）解读贾平凹的《商州三录》，对几部作品中反映出的农村生活转变进行分析，认为贾平凹通过描绘商州山水、风尚及人文气息，以农村生活的转变反映社会变革声浪中山沟人生活的种种变化。余佳睿《浅析贾平凹小说中的民俗文化》（2015）对贾平凹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进行分析，认为贾平凹的乡土书写，既写出了乡土的秀丽，也写出了乡土的哀愁，在继承传统民俗同时，又突出了时代的印记。何英《乡土小说的三种面目——以莫言、贾平凹、阎连科为例》（2016）将贾平凹与莫言、阎连科进行对比，通过比较分析了三者在乡土书写上的不同特色，总结出了乡土小说的三种面目，分别概括为：莫言——“民间”的狂欢，贾平凹——沉重的肉身，阎连科——概念的预言。陈宗俊《故土的执著守望——贾平凹乡土小说论》（2016）从三方面解读了贾平凹对乡土的执着书写特征，即对故土奇景、奇人、奇俗的描写，对故土自然、人物、事件及生命体验的神秘探幽，对故土现代化进程中人性撕裂的思考，并探讨了作品中存在的不足及其所反映出的作家创作瓶颈。秦崇文《比较视域中的乡土书写与现代性想象——以福克纳和贾平凹作品为例》（2017）对贾平凹和福克纳中外两位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概念剖析、对话理论分析、书写内容和技法比较等方法，指出中国现代性不同于美国现代化转型道路，其因具有厚重“乡土”色彩和“后发外生”特性，在于外域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彰显独特乡土中国当代内涵。王华伟《来自乡土的“呐喊”——兼论贾平凹的中国经验》（2017）认为贾平凹的乡土书写，从记忆中的“小商州”出发，积极参与“大商州”的体验书写和营构，呈现“最后乡土”的本土性、故事性和问题性，突破地域局限后，则照应着中国宏观的时代与环境变化，体现了贾平凹的文学自信和中国经验。曹霞《乡土中国的文化遗魅——论贾平凹的乡土书写》（2017）认为贾平凹的乡土书写，实现了对文化中国的浑融再造，也写出了城乡对峙下的乡土悲音，还奏响了“海风山骨”里的文化挽歌，在传

统与现代的矛盾纠葛间，呈现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诸多悖谬。赵少荣《贾平凹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乡土叙事研究》（2018）从乡土叙事的缘由、叙事中的乡土构建、乡土书写背后的反思及启示三方面，分析了贾平凹新世纪以来小说的乡土叙事内涵。李佳贤《贾平凹的乡村常态世界——以<秦腔><古炉>为中心的一种考察》（2018）从乡村常态的视角切入，选取《秦腔》、《古炉》两部长篇小说为素材，对作品呈现的以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无为而治”的乡村世界、渗透“齐物”的自然敬畏等为代表的乡村常态世界特征进行了解读。王华伟《乡土空间的“新文化”反思——以贾平凹小说为例》（2018）从城外的“老空间”与乡里的“新文化”两个角度，探究贾平凹作品中的城乡空间与新旧文化的复杂关系，从其乡土书写中能够反映出作者的现实关怀情意与文化批判情怀。张丽军、程孝阳《走不出去的乡土中国——贾平凹小说的乡村世界及其人物形象分析》（2018）对贾平凹小说作品中的乡村世界及其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将其作品中的人物归纳为站在土地上的乡村反叛者、逃离土地的乡村背叛者、执着留守在大地之上人，并对不同人物形象特征做了讨论，反映了贾平凹对乡土中国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钟思远、杨耀菡《情融故乡山水，志守精神家园——贾平凹<商州初录>的生态意识与文化价值浅析》（2018）认为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审美观照，描绘了一个充满灵性、诗性和人性的乡土社会，蕴含着贾平凹对自然及社会问题的历史反思，以及投身当代文化价值创造的努力。李彦仪《乡土游魂的城市救赎与病态书写——论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2020）以贾平凹小说《高兴》为素材，探讨了小说中刘高兴、五富、孟夷纯等“进城者”的悲剧，及其背后反映的城市化过程中对部分个体的异化，以及城市对乡土游魂的吞噬和禁锢。

三、以空间理论为视角对商州世界的研究

袁红涛《发现商州：一个“地方社会空间”——重读贾平凹的一种方法》（2019）以贾平凹作品《腊月·正月》为中心，围绕小说中人物韩玄子展开分析，指出《腊月·正月》是贾平凹打开的地方社会空间，标志着作者空间意识的萌发，认为只有建立“空间”意识才能把握作家艺术追求，从社会空间的发现与建构的视角，才可以将对作家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才可以对作家的创作道路有更深层的理解。推进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将更新并深化对当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史的认识。郭萌、赵学勇《地理的空间与文学的意象——以贾平凹小说创作为例》（2011）以贾平凹代表性作品为素材，

围绕地理空间基础上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自然地理环境构成文学创作的自然意象，人文地理环境生发文学创作的文化意象，阐释了空间对文学意象的作用。魏华莹《时间在空间中流淌——读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2013）以贾平凹小说《腊月·正月》为材料，分析了作品中描写的中国社会变革时代背景下，陕南山区近于封闭的乡村空间结构中，观念、价值体系受到的冲击，以小空间中的人、事、物反映大社会、大时代的主题。杨波《<极花>乡村叙事的空间向度》（2017）对贾平凹小说《极花》中叙事的空间响度进行了分析，指出贾平凹在该作品的表层叙事下，描绘了所处时间背景下，农村生态破坏、民生凋敝、文化失范的现实图景，构建了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乡村社会空间形态。李遇春《异托邦叙事中的现代空间焦虑——论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暂坐>》（2020）在对贾平凹长篇小说《暂作》的评论中，认为该作品表达了人对现代空间的焦虑，这种焦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是跨越国界的，焦虑的根源在于现代城市另类空间中的异托邦体验，还隐含人类对未来空间的恐惧，其揭示了现代城市空间的虚妄。王西强《论贾平凹与莫言小说的文化母本与叙事空间营建》（2020）对比了贾平凹与莫言两位作家的叙事空间营造特征，分析了其中异同点，指出两者相同的是都在故乡找到了叙事场域和叙事激情，相异的是叙事场域的时空外延差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想象的故乡”，也是作家精心营造的叙事场域，但不是写作中心和重心，而贾平凹的“商州”却是“实在的故乡”，且先成为写作中心和重心，后变为叙事场域。

整体来看，前人对贾平凹文学作品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贾平凹塑造的“商州世界”研究较为多样，在空间理论这一视角下也有深入讨论，但在商州形象的变迁，尤其是“商州”破碎之后的重构方面，研究还较为有限。而“商州”作为贾平凹的现实生命与文学生命之根，其形象变迁恰能够反映出贾平凹创作思想上的转型变革，对于贾平凹作品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本文选取《贾平凹的“商州”：从破碎到重构》为题，恰是在前人丰富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商州形象为线索，对贾平凹的作品及创作思想进行研究。

第二章 贾平凹与他“破碎的商州”

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发展过程”。因此，文学作品“并不是简单地对客观地理进行深情的描写，而是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是具有复杂意义网络的一部分”[①]。商州作为贾平凹的文学故乡，从其开始创作起即成为作者须臾离不开的意义基点，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淳朴神秘的人文生态、优雅与粗鄙、率性与虚伪、禁忌与野蛮、美丽与伤痕悖谬地融为一体的风俗仪轨、人性人情等，成为贾平凹观照商州的温情之眼，商州与贾平凹也就成了彼此的符号。因此，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浮躁》《商州》《腊月·正月》《土门》《怀念狼》《高老庄》等，贾平凹豪不吝惜笔墨，描绘、赞美商州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初步构建起了“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空间。他的“商州系列”为其赢得了身前身后名。

现代性的纵横播撒，全球化的攻城略地，即使地处边缘的商州，也要遭受它的劫持与掠夺。曾经作为贾平凹灵魂栖居之地的商州，非但不再为贾平凹提供抚慰和疗伤的功能，反而成了他思想的重负——一种创伤的重负。因此，《秦腔》及其后的作品，贾平凹一改往日对商州深情的回眸，而是将其在时代巨变中的“破碎”以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完整再现出来，商州的诗意与光晕，商州的温情与温暖，开始被一种创伤与焦虑，疼惜与哀婉所取代。如此一来，他的《秦腔》也就成了“为故乡竖一块碑”的纪念。然而，为已破碎的商州立一块“碑”的愿景，其实却成了开启贾平凹痛苦情感的渊薮。因为，当他以现实主义精神通过传统的迷失、景观的破坏以及民俗的解体等方式再现商州的破碎时，是以一种刮骨疗毒的巨痛触及他曾经的温情。

第一节 传统的迷失

贾平凹的作品创作中，有着浓厚的传统思想呈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贾平凹被县上推荐到西北大学，有机会远离商州，当他以“回乡者”的身份再次返回商州时，曾经早已司空见惯的故乡景观：山石、清泉、明月、清风以一个带着陌生化气息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了作家眼前，此时的贾平凹按耐不住内心的创作灵感，有意地将这些商洛山水、风土人情当成写作素材，向读者展示商州世界的淳朴与美好。如在《商州初录》，

①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 宋慧敏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53.

贾平凹就将商州“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着野情野味的神秘的地方”描写的又质朴真实生动传神。“外面的世界愈是城市兴起，交通发达，工业跃进，市面繁华，旅游一日兴似一日，商州便愈是显得古老，落后，撵不上时代的步伐。但亦正如此，这块地方因此而保持了自己特有的神秘。”[①]所以，贾平凹笔下的商州故土，虽然被认为是天下最贫困闭塞的地方，但却是绝佳静谧的自然天堂。这里的山林层峦叠嶂，隔离了城市的喧嚣嘈杂，“群山有势，众水有脉”，“山是青石，水是湍急”，溪流遇石翻起细小的浪花，清泉中欢快的鱼儿随手可捉，咕涌的泉水甘甜养人。“商州世界”里，熙攘热闹的黑龙口，有热情朴实的旅店老板；位置隐蔽山货丰富的莽岭一条沟，有给狼治病的传奇老汉；门前桃花夭夭，屋后绿竹成荫的桃冲；那一对儿为情私奔的率性男女；结为连理的复退军人和寡妇引领时尚的聚集地龙驹寨等等。商州土地上险峻的山野胜景，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真实古朴善良可亲的村民，无一不展示着“商州世界”的纯洁静谧、悠然和谐之美。神奇的自然风情，诗意盎然的生活方式，以及野性而又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至善至美的精神况味，共同构筑起了一个充满乡野气息而又和谐共生的美好生存境界。[②]这样美好的呈现不仅仅在于“商州”这一地理空间的美好与野性，更在于贾平凹自身独特的写实才能。谢有顺在赞赏贾平凹的独特的写实才能时说：这首先得力于贾平凹超常的语言能力，他对古白话小说遗产的娴熟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获得了惊人的表现力。同样，王一川指出：“这种语言并非单纯的‘技法’，而是文艺领域的依托着深厚的古典宇宙观和美学精神的基本表现方式。这种古典宇宙观和美学精神表现为自无而有、虚中见实、以形写神、以少总多、气韵生动等原则，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的东西。” [③]贾的小说充满着浓郁的民族气息，深厚的东方韵味，古拙、质朴，如同一幅幅古典的中国水墨画。

耐人寻味的是，贾平凹不仅在商州形象中窥探到了民族生活之根，而且还以现实主义精神如实再现出商州乡土的变迁历程，以及“商州世界”中乡民们生活状况和心理情绪变化的痕迹，如他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难能可贵的是，贾平凹不仅以商州为中心民族志再现着陕南自然清丽的风土人情和浪漫气息，而且还敏锐触及到时代巨变中商州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动，以及其中人们精神世界的躁

① 房利芳. 论贾平凹小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J]. 贵州民族研究, 2009(01): 5.
② 张慧娟. 魂系商州古韵西京——贾平凹长篇小说艺术论[D].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1: 12.
③ 王一川. 中国形象诗学[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90.

动不安，如他的《商州》，即讲述了民风淳朴的乡村生活中所蕴藏着的“变”，曾经乡村的古拙与闭塞，如今在城市化进程中面目全非，种种对比透露出了作者的迷茫与不安。作品中，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拉开序幕，商州地区逐渐出现了大量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水泥厂、石灰厂、食品厂、糠醛厂等各类工厂在线程、在农村遍地开花，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曾经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商州世界开启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时代。整个“商州世界”里的风物人情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时代发展经济繁荣的浪潮势不可挡，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的社会道德问题，逐渐暴露亦不容忽视。此时已经在西安居住多年的贾平凹，“执著地选择当下社会生活变革给人们生存和精神带来的巨大震荡作为自己的表达对象，一定程度上切中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创伤，揭示了迈向幸福承诺过程中的人们巨大的感奋、矛盾与痛苦。”[①]贾平凹密切观察并关注着这些乡村的巨变，正是这些变化，引起了商州世界中传统的迷失，这些迷失也成为了商州“破碎”的重要表征。何为传统的迷失？笔者界定为传统艺术的衰落、传统技艺的流失、农耕文化的迷失以及传统乡土伦理关系的解体。

首先是传统艺术的衰落。如《秦腔》中，贾平凹对秦岭地域传承两千年的传统艺术形式“秦腔”的衰落进行了描写。在书中原本作为黄土高原上人们精神支柱的秦腔，经历了古老的历史延续，深刻融入“商州”地域空间内人们的生活。但时代变革的巨轮带来巨大的碾压力，新文化的“侵入”势如破竹，不仅传递至宁静的乡村，更闯进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以至于千百年来钟爱秦腔的人们，也将之视为寒蝉、落后的小民技艺。正如《秦腔》中在省城工作的夏风对秦腔的评价：“说到底不过是个农民的艺术么，你要是在省城参加一次歌星演唱会，你就知道唱戏的寒碜了！”[②]

在秦腔声中成长起来的夏风，已然没有了祖辈对秦腔的情感，寥寥几句，便表现出了对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轻视、厌倦，同时也含有对“农民”这一乡土身份的轻视。秦腔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代表性产物，在现代性流行、文艺、娱乐大潮中，被新生事物“演唱会”彻底击败，无法吸引新生代的关注，呈现出衰落、颓败的局面。这种衰落与颓败不仅表现在新生代的轻视上，也表现在传统艺术传承上的危机。最终，夏天智以秦腔脸谱覆面而后与世长辞，不仅仅隐喻了老一辈人对秦腔的执念，也隐喻着传统的瓦解与消逝。“故乡的巨变引得作者哀叹‘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作者的笔墨

① 孟繁华. 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J]. 当代作家评论, 2009(01): 14.
② 贾平凹. 秦腔[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34.

见证了乡村正在走上一条畸形的路，一条异于它的不归路，作者眼里的故乡正在和记忆中的故乡渐行渐远，所以作者将故乡苍老去的背影和人情冷暖的变迁叙写成碑文，痛楚地低吟着挽歌为家乡树碑。”[①]《秦腔》中贾平凹描写了新一代秦腔表演者的变化，他们对秦腔表演的热情已然无法与前辈相比，早已没有了对这一传统艺术的忠诚炙热，反而对流行歌曲的喜爱日益增加，以至于传统的剧团可以通过流行歌曲的演唱点燃大量村民的热情。相较之下，秦腔表演的冷场，则成为了一种无声的哀叹，哀叹着传统在现代中的迷失。

其次是传统技艺的流失。如《古炉》中的烧瓷技艺，也是代表传统的文化遗魅。贾平凹将村子命名为“古炉”，但描绘的却是一个再也烧不出好瓷的地方，“古炉”成了衰落的废炉。小说开篇贾平凹便写到了一个用来装油的青花瓷瓶，借狗尿苔之口讲出“这瓶子的成色是山上的窑场一百年来都再烧不出来了”[②]，点出了传统烧瓷技艺的衰落。随后在第三章又写了古炉村烧瓷的历史悠久，从夜姓祖先烧窑，到向朱姓外甥传授技艺，再到夜姓人丁衰落，朱家日渐兴旺，朱家分支去了洛镇，夜家人口稀少以至窑业衰败，“竟然再做不了艾叶青和天青一类的细瓷了，只专门烧盆烧碗烧些面罐和水瓮”。[③]又讲述了“古炉”村清代漫山窑炉，弥野皆明的盛景。古炉的衰落，也是传统烧窑技艺的衰落，从狗尿苔打碎青花瓷，蚕婆只心疼油，就可以看出，村民对于烧瓷技艺传承的态度。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村民们在政治驱动的狂热情绪，以及复杂的利益关系中，投身于对利益的追求，传承技艺的窑炉也变成被争夺、抢占的利益。传统技艺失去了纯粹的传承环境，在时代变革中流失。

同样，令人心痛的是，不只是传统艺术，历经千年积淀、延续的农耕文化，也在大时代背景下走向迷失。“商州”是贾平凹创作中乡土的代表，立足土地之上的农耕文化，代表着传统、自然、朴实、勤劳、自足。大时代的发展不可抗拒，城市对农村进行了从思想到生产方式，到资源配置，再到社会生活等不同形式的入侵，导致了农耕文化从稳固的封闭空间文化，走向了开放、融合，甚至走向了破碎和解体。这种变化引起了贾平凹的深度思考，并将其以文字书写出来，以一种“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而留给历史”[④]的自觉意识，并“以陕南农村为起点透视折射出了整个中国

① 王俊虎. 论贾平凹文学创作中的农民视角[J]. 小说评论, 2013(03): 149.
② 贾平凹. 古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67.
③ 贾平凹. 古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169.
④ 贾平凹. 高兴[M]. 广西:漓江出版社, 2012: 268.

的时代巨变”[①]。《秦腔》中人与地的关系错综复杂，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不断增加，农耕地逐年减少，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生产方式带给清风街人们的是艰难的生活。省城的生意人将城市的美好幻想传递给农村人，以翠翠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对省城产生强烈的向往。土地不再是乡村人不可分割的根，寸土必争的景象也不复存在，越来越多人舍弃土地，叛逃向城市。《高兴》中，刘高兴和五富等，也是从土地叛逃向城市的代表人物，他们奋力摆脱土地的束缚，来到向往的城市，但城市给他们的却并不是幻想的美好，而是真实的残酷。缺少文化和技能，他们只能挣扎在城市的最底层，以至于走向悲剧，这也是城市农耕文明中对流失的灵魂的另一种吞噬。

最后，以土地和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形成的传统农业社会关系被打破，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方社会空间原有的稳定性。土地流失、农村人口流失、乡村生产结构变化、社会关系改变，又导致了另一种必然结果，即传统朴素的社会风气的瓦解，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弱化。《秦腔》中随着清风街生产方式的改变，利益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在利益驱使下，出现了投机倒把、见利忘义的人，夏天义、夏天智谨守的传统道德，在其后代身上却出现巨大动摇，晚辈为赡养父母之事争吵打斗，至亲情于不顾，夏风因女儿畸形将其遗弃，翠翠堕落，文成抢劫，在最保守的乡村社会中，卖淫、出轨等现象产生，传统家族、婚姻关系对个体的约束瓦解。在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选择上，以夏天义为代表的老一辈乡村干部，将集体利益放在前面，不会贪占一丝一毫，但新一代“权力者”夏君亭则以权力换取私利，通过“适度”的贪污与暗中操作，达成个人利益的目的。还有贪污票款的雷庆与梅花，也舍弃了老一辈坚守的道德。这些印证着乡村淳朴民风被彻底击碎。

通过作者对商州破碎的表征的描述，不仅仅写出了传统在现代性铁蹄之下的末路，也透露出了贾平凹的担忧与迷茫。商州和省城相比，一个是所谓的落后，一个是所谓的文明，那么，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还适应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衍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②]贾平凹自己在访谈中也说到：“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已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而我之所以还要沿用这两个字，

① 李佳贤. 不变之变：贾平凹笔下的乡村世界——以《秦腔》《古炉》为中心的考察[J]. 当代文坛, 2018(02): 87.
② 程华. 贾平凹与商洛文化[J]. 商洛学院学报, 2016(01): 7.

那是我太爱我的故乡的缘故罢了。”[①]他笔下的“商州”已经超越了行政区域的划分，映射至全国，“……他构建起来的‘商州世界’也衍射出整个中国乡村的发展影像。《秦腔》捕捉到了传统的中国乡村向‘半耕半工’转变的图景，反映了由‘乡土中国’向‘市场中国’转变过程当中农村与农民的阵痛，为我们奏响了一曲悲壮的乡村‘挽歌’，《古炉》亦是如此”[②]。

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一直是贾平凹在文学创作中思考的焦点。他关注着乡村的命运，通过书写传统技艺的衰败、农耕文化的迷失、朴素乡土社会关系的瓦解等，描绘出了传统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消亡与瓦解，记录了地方社会空间的变革，展示了一个破碎的商州形象。

第二节 景观的破坏

景观是一种记忆，一种体验，一种话语，一种地区内的情感凝结体，大量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独特途径。[③]因此可以说，“地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所共有的经历。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困在它的周围。这种活的联系把人们与地区联系在一起，它让人们为自己定义，让人们与其他人共同经历并组成各个社区。”[④]贾平凹记忆中的“商州”景观是宁静淳朴的田园牧歌，他所描写的商州无论是现实的商洛还是文学的商州，都融入了大量自然景观，如丹江河、荆紫关（《小月前传》），古塔小溪（《鸡窝洼的人家》），烟台峰（《古堡》）等，展示了商州景观之美。作家在这些作品中不断地赞美着陕南地区人民的淳朴与天真，以及故乡景色的诗情画意，尽管那时的商州是个落后、闭塞的地区，但那时，这里的美好“似乎是天地自然的有心安排”[⑤]，这里“神奇的自然风情，诗意盎然的生活方式，以及野性而又鲜活的人物形象和他们至善至美的精神况味，共同构筑起了一个充满乡野气息而又和谐共生的美好生存境界。”[⑥]但是，在时代发展与社会变革下，贾平凹密切观察着的“商州”已不再是曾经那样的野性和鲜活，已然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发生着巨变。当旧时的景观（不

① 贾平凹. 浮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6.
② 李佳贤.不变之变: 贾平凹笔下的乡村世界——以《秦腔》《古炉》为中心的考察[J]. 当代文坛, 2018(02): 87.
③ 菲利普·韦格纳. 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A].引闫嘉, 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3.
④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宋慧敏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96.
⑤ 贾平凹. 老西安.[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149.
⑥ 王玉珠. 商州儿女的诗意栖居与诗性精神——生态视域下重读<商州初录>[J]. 阴山学刊, 2011(05): 67.

只是自然景观，也包含人文社会的景观）不断被破坏，记忆中的田园也被现实的田园所取代，贾平凹的作品也将一幕幕讲述着“商州”的不再。

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的崛起，乡村难以跟上城市的步伐，且由于其相对封闭性，也不能快速适应新思想、新事物的冲击，实现平稳过渡，这就导致了现代化与传统性之间的矛盾产生，城乡之间的二元对峙也由此形成。城市现代化发展伴随着规模的扩大，以及资源需求的增加，城市自身难以实现自足，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市场环境落后的乡村，无疑成为了城市资源索取和市场延伸的对象。在这样的原因和背景之下，曾经独特而又充满神性的地理景观的消亡，曾经传统而又充满人情的人文景观逐渐消亡在了商州世界里，“商州”景观上的破坏应运而生。

景观的破坏首先体现在地理景观之上。在贾平凹对商州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描绘了大量的动植物形象，如《山本》中的老皂角树，《古炉》中的白皮松，《怀念狼》里的狼群，以及散见于作家作品中的各种奇珍异兽、花鸟鱼虫，这些独特而又具有神性的动植物角色，都是构成商州世界独特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城市对农村的资源掠夺，曾经独特的地理景观却也逐渐消亡在了时代的变迁中。如《怀念狼》中，商洛地区曾经兴盛的狼群，到故事讲述时只剩下 15 只，成为需要政府保护的区域性濒危物种，最后的 15 只狼也因为人的思维定势与狂妄自大一一被捕杀。随着最后一只狼被打死，“商州”狼群的景观彻底消失，景观的破坏却并未结束，猎人们因为没有了狼的影子，日渐衰弱，一个个得怪病死去，猎人与狼从对立关系走向了相同命运，捕狼队意气风发盛景也从此不再。在《秦腔》的乡村景观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发展对乡村的侵蚀。《秦腔》中写到夏天义曾在七里沟淤地见过狼，却不认为那是狼，原因则是过去二十年间走遍这里每一处，狼都没出现过。更深层次地来看，狼的消失正是因为现代化建设不断增长的物质资源需求下，山村林木资源被大肆砍伐，成为城市高楼大厦的建筑原材料，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与此同时，人与土地的矛盾，也在现代化建设中日益激化。正如《秦腔》中的“清风街”人多地少，耕地紧张，人们对这一不可替代的农业生产资源有着强烈的执念。在国家要求退耕还林的大形势下，狗剩和其他七户人家在退耕还林区域伏牛岭上种白菜，恰巧被乡长看到，被发现后，不仅撤销了耕地补贴，还要罚款，狗剩在恐惧和无奈之下喝农药自杀，最终以他的死换来了取消罚款、恢复补贴的决定，清风街也出现了更多“退耕还林”的标语。这样的情节，一方面突出了人地矛盾的激烈，同时也印证了曾经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对记

忆中“商州”自然生态景观的破坏，退耕还林在艰难中推进，生态恢复远远达不到让曾经搬家离去的狼回归的程度。

又如《秦腔》中作者还写到坚守土地的乡村干部夏天义下台后，作为现代经济拥护者的夏君亭上位，将七里沟作为水库绿化带发展旅游业，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旅游业发展超出了生态承载力，导致水库污染严重，离开土地的人增加，又导致土地的大量荒废。夏天义与夏君亭的矛盾，也正是关于土地的矛盾，夏君亭想用七里沟与别村兑换鱼塘，夏天义便以死相谏，说道：“人口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来越少，你只顾眼前，不计长远，糟踏了十八亩地又要扔掉一百亩地，到你死了，埋都没个地方！”[①]土地是乡村农耕文明的基础资源，更是乡土“商州”最大的景观，但在时代的发展中，土地资源不断减少，夏天义的话正点破了乡村最原始景观不断破坏的现实，土地滥用、荒废与破坏，是摧毁乡土家园原本面貌的强力一击。

同样被破坏的还有商州世界中的人文社会景观，并且被破坏的程度要甚于前者。乡村在空间属性上，离不开社会与文化，乡村所呈现出的景观中，以人文社会景观最能体现乡村区别于城市或完全自然的地理空间的特征。[②]乡村人文社会景观在传统意义上与乡村的发展水平、生产方式、群体思想意识等有很大关系。贾平凹记忆中儿时的乡村，是简朴、纯粹、宁静、安详、和谐的，这也是大多数人对曾经的乡村的认识。但随着现代化建设给乡村带来冲击和变革，其原有的人文社会景观也发生了改变。如《秦腔》中，现代化经济发展模式的进入，改变了乡村的面貌，夏君亭不顾村民反对建起了农贸市场，但山里本没有多少物资可流通，同时，山里发展旅游业，也出现了以往城市才有的酒楼，丁霸槽开的万宝酒楼，提供吃、喝、住一条龙服务，但对于贫瘠的山村而言，酒楼的消费并不是一般村民支付得起的，有权有钱的人才是主要消费者。国道开通后，城市里的收费厕所也被有经济头脑的丁壩槽引进乡村，成为乡村商业景观的一部分，丁壩槽利用比城里便宜的收费，从中牟利。这些原本离山村乡土田园本质甚远的事物出现，打破了山村本来的图景，带来了城市现代文明的痕迹。生意人的涌入，也带来了村民在生活景象的巨大变化，唱秦腔的不再爱唱，爱上流行歌曲，土地上生长的孩子，不再勤劳务实，一心想要到城市过现代生活，人际关系不再淳朴、纯粹，村民之间勾心斗角，为权力、利益不断争夺，生活既不像城市，也不再像农村，

① 贾平凹.秦腔[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45.
② （德）菲迪南·滕尼斯著. 林容远译. 共同体与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9.

形成一种撕裂状态。

人文社会景观的崩坏，原因不仅仅在于现代性和传统之间的矛盾，更是来源于当地人民的愚昧与无知。如《古炉》中，人文景观的破坏源于一场政治动荡。古炉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烧瓷的窑厂，村中只有一个窑厂，从过去的传说中可以听到古炉村烧瓷产业的辉煌，如今已经没落到“一百年也烧不出青花瓷”“再做不了艾叶青和天青一类的细瓷了，只专门烧盆烧碗烧些面罐和水瓮”，但即使这样的生活依然无法保存。窑厂代表利益，也是古炉村夜姓、朱姓两家竞争的焦点。借助特殊时期的“革命”，古炉村掀起大量政治运动的浪潮。破四旧、审查、批斗、造反、武斗，表面是革命，实质上都是在政治运动唤起的利益诱惑下，冠冕堂皇的争夺以及仇恨情绪的宣泄[①]。霸槽的红色榔头战斗队与天布的红大刀革命造反队发生武斗，红色榔头战斗队抢占窑厂，又遭对方围攻，代表古炉村的窑厂被砸毁，村中另一处代表性景观——宝树也被下令炸毁，善人以树为柴自焚而死。原本山明水秀的宁静村落，在这样的动荡下面目全非，早已没有了理想的乡村家园的样貌，无论是窑厂、宝树，还是曾经和谐纯粹的生活景象，都在巨大的熔炉中被摧毁得支离破碎。

山民的愚昧与无知在《老生》中更有着淋漓尽致地体现：老城村并不是理想田园一样的宁静山村，从枪代表的现代性暴力进入村落开始，乡村、家庭与个人就已然发生了改变。如果说 20 世纪早期游击队进入时期，以及土改时期由于历史久远，并能充分反映乡村景观的破坏，那第三个故事中所述文革时期“斗争”的荒唐，则更具代表性，尤其是选择全村最漂亮的女人为坏分子的情节，无疑让传统的乡土人文社会认知彻底消失。此外，还有《极花》中的乡村，靠拐卖妇女延续可怜的生命力，年轻劳动力外流，不只是年轻男人，还有女人，乡村的空心化、土地的荒废，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连繁衍都无法完成的乡土空间，显然是衰败、凋敝的，这里的人文社会景观，也在城市发展的冲击和撕扯下，陷入破坏和颓败[②]。

现代性的冲击下“礼崩乐坏”的乡土社会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都被城市化打击得溃不成军。作家在《秦腔·后记》中也表达了农村的深深担忧：“国家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怎么办呢？……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

① 宋义霞. 贾平凹《古炉》对“文化革命”悲剧性的审美反思[J]. 求索，2012(08)：3.
② 杨波. 《极花》乡村叙事的空间向度[J]. 重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6.

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走出，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①]但是，尽管传统文化逐渐羸弱且式微，民间却依旧承载着民族的生命力和文化之源，让其与城市的文明链条对接迫在眉睫。可社会改革带来的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城乡贫富差距与失衡横亘在了人们面前，更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城市的快速发展吸引去了农村年轻的劳动力，农村只剩下空巢老人与儿童，呈现出“空心化”的局面。这样被老弱病残充斥着的“礼崩乐坏”的乡土社会，何谈重建与重生，何谈与城市文明接轨？虽然农村的确不应该成为现代化进程之中被遮蔽和失语的存在，更不该扮演者受害者甚至牺牲者的角色，但是，基层政权的寸步难行，农村生命力的流逝、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土崩瓦解都使得农村的发展举步维艰。自然景观和人文社会景观的破坏，打破了“商州”原有的样貌，呈现了作为精神家园的乡土“商州”在时代变革、现代化发展、社会动荡中所经历的冲击、撕裂、痛苦，这种痛苦也反映了贾平凹对乡村命运的关注与忧虑，这是贾平凹对眼前已非商州的“商州”面貌的真实书写，也是贾平凹对商州直观形象的破碎的哀叹。

第三节 民俗的解体

“贾平凹的小说是一种独特地域文学, 基于独特的商州历史文化积淀和传统民风民俗的侵染, 它呈现了陕南地域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②]商州乡土民俗是贾平凹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也是其作品中的重要素材。贾平凹本身是关注和重视民俗的，他不仅大量搜集了的商洛地区本土的婚丧习俗，神秘的巫鬼文化，以及民间生活习俗的素材，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每到其他地方，他也非常注重民俗的搜集和体验，这也对他的民间叙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形成其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贾平凹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民俗文化的书写。如生育相关的民俗书写，《瘪家沟》中人们虔诚拜“瘪神庙”求孕育，认为“心诚得子”；《初人四记》中，主人公想要生子，带女儿去瓜田偷瓜，再把瓜放在妻子被窝里，以求“偷瓜送子”；《土门》里，魏小小抱着新生的儿子出门，将碰见的第一个人认作干爹，干爹要按照习俗给新生儿

① 贾平凹. 秦腔[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399 .
② 麦成林,耿菊萍,王伶俐. 贾平凹小说的商州民俗[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03）：56.

扯红布、包红糖、染红鸡蛋。又如婚嫁相关的独特传统民俗书写，《天狗》中，描写了李正瘫痪，让其妻子“招夫养夫”的独特婚俗；《浮躁》中描写了丧偶的田中正娶守寡弟媳的“转房婚”，以及麻子铁匠当上门女婿的“入赘婚”的习俗；《鸡窝洼人家》则出现了兄弟两个家庭互换妻子的落后婚俗；《古堡》中也描写了用家中女儿给儿子换媳妇的换亲婚俗；《五魁》中描写了商州旧时的抢婚习俗。再如丧葬相关的民俗，《美穴地》中描写了乡村地区选美穴吉地以求家族兴旺，以及通过踏穴以求死者庇荫后代子孙的习俗；《商州又录》中描写了横死者不能进家门，要在棺材上绑雄鸡直到坟地，用以引魂的丧葬习俗；《秦腔》中也描写丧礼唱秦腔、用银元让死者闭幕、抬棺下葬等丧礼习俗。还有关于饮食生活的民俗，如《商州初录》中所描写的商州人熏制和食用腊肉的民俗；《冰炭》中描写了商州人吃“杠子馍”的习俗；还有《秦腔》中的锅盔、油泼辣子等，也都是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美食的写照。关于民间“巫鬼文化”的民俗在贾平凹文学作品中也很常见，如《天狗》中请风水先生念救水咒，驱邪除鬼，来祈求打井顺利；《西北口》中描写了一系列祭祀活动，来祈祷神灵保佑风调雨顺；《古堡》中人们祭拜宝树，抢撕红色布告来辟邪，也是对巫鬼传说盲目崇拜的结果。

“民俗文化是民间风俗习惯与生活习惯的统称，它既能体现物质性又能体现精神层面的特点。”[①]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陕南社会中，民俗有着巨大的作用，民俗不仅仅体现着乡村人际关系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更是凝聚着乡土人民的认同，某种程度上更是维护着乡村结构的稳定性和凝聚性。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加快，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乡土结构，“农村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强者欺弱、富者欺贫、少者欺老，寸土必争、寸利必得、宗族械斗、山林纠纷，甚至父子干仗、兄弟反目等现象，”[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凝聚着传统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的民俗文化岌岌可危。民俗文化是贾平凹笔下“商州”的重要标志，而在贾平凹的后期作品中，民俗的解体则成为了商州破碎的标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丧礼习俗的崩坏和传统信仰的解体。

商洛传统民俗中丧礼要隆重操办，又有着丧礼唱秦腔的习俗，然而在《秦腔》中，夏天礼死后，晚辈对于很多丧礼习俗已经不甚了解了，也没有丧礼上唱秦腔的描写，

① 朱恒．试论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传统[J]．贵州民族研究，2018(07)：132.
② 李兴阳．乡村伦理道德的失范与批判——新世纪乡土小说与农村变革研究[J]．长江丛刊，2020(06):90.

侄媳妇白雪就在剧团工作，此时也下了岗。夏天礼在命名上代表了“仁、义、礼、智”中的礼，但夏家后代却已经将传统礼俗抛之脑后。到夏天智死时，夏家老老小小只知道哭，全哭瘫到了地上，“除了哭竟然都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最终还是上善来主持，安排设灵探，清理棺材，以及其他活计。到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曾作为礼仪道德典范的夏家，此时已经无人能够传承传统的丧仪习俗，民俗的解体在夏家这样的大家族中，已经可见。夏天智的葬礼上，儿子夏风迟到，村中因青壮年外流，连抬棺、启墓道的精壮小伙子都难找，人手不够，也可见民俗解体的另一个原因，正是城市快速发展下对乡村劳动力的吸引和掠夺，空心的乡村，连完成民俗仪式的人力都在消失。夏天智丧礼按照传统民俗，唱起了秦腔，人却都被东牌楼陈星唱的流行歌曲吸引走了，秦腔的衰微之势尽显。狗剩喝农药自杀后，夏天智曾资助过狗剩的儿子，夏天智的葬礼上，狗剩儿子早早到来，却是为了吃馍而来。更可悲的是，夏天智丧礼过了许久，坟上却依然没有墓碑，夏风过了头七便回了省城，夏雨等着夏风安排立碑之事，原本乡村民俗中安葬长辈，建墓立碑，在这里也成了可以长期等待甚至搁置的事，反而不如重新分地的事让晚辈重视，最终连坟都在山体滑坡中被埋没了。山体滑坡中，一同被埋没的还有夏天义，村中没有年轻劳动力，老人小孩和妇女无法从滑坡的土石中找到夏天义，最终夏家晚辈商议，竟然以“权当厚葬”做了结果，连具体的坟墓都已没有，更不用提寻找美穴吉地。如夏天智死时一样，夏家人只是“哭得汪洋一般”，丧礼民俗已无踪迹，五个儿子和媳妇却为了立碑的钱吵闹。夏雨把给夏天智准备的石碑让给夏天义，最终碑上也未刻字，留下一个白碑子，等夏风回来刻字，夏风却再未回来。《秦腔》中的丧葬习俗，随着夏家老一辈的相继去世，以及时间的推移，逐渐解体、消散，至夏天义死后，支离破碎。

丧葬习俗的支离破碎也体现在《古炉》之中。《古炉》描绘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下民俗解体的破碎“商州”。古炉村原本是一个偏远、封闭、传统的宁静村落，文革的巨浪蔓延到这里后，在“革命”的狂热，以及由小利小益和鸡毛蒜皮放大而来的激烈仇恨作用下，导致了古炉村原本样貌的全面崩溃，长久以来保持的传统风韵被狂澜击碎，理想中的乡土家园，变成了残破的精神废墟。《古炉》中描写了立柱母亲生病，立柱把家人叫来要商量后事，却因为多买了两套寿衣的钱而导致兄弟间大吵大闹，甚至最后立柱说多买的自己留下穿。后来立柱“说死就死了”，也不禁让人唏嘘。古炉村不仅仅是古炉村，更是当时传统乡土中国的一个缩影，“这个以烧制瓷器为生的村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96221233052010044